

Various Cultures, Interactive Influences:

the Cultural Forces of Influencing the Central Asia

Multiculture Influence mutuelle:

les facteurs externes de la force culturelle qui influencen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moderne de l'Asie centrale

多種文化 交互影響

——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發展的外部文化力量因素

Wang Jinguo Zhao Yigang

汪金國

趙義剛

Received 15 March 2005; accepted 24 March 200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n society is a complex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conflict and conf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ll sorts of cultures.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entral Asia once more came to the fron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any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in the global stage. On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Central Asian societies, surely there will be many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converged. The collision of these factors will forcefully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rections of Central Asia area, and deduct an either visible or invisible, could-sustained-to-future communication or contest. What's more, with the high-tech (including advanced military equipment)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the continuous imping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s possible during the peaceful communication of all sorts of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Obviously, in Central Asia there exists not only amalgamated and assimilated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of ancient Central Asian nationalities, but also newcomers, such as western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Russia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Hence, when the native cultures and forces communicated and merged with each other, there will also b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contest and dispute between native cultures and alien cultur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and intercross of these influences, peaceful cultural sp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will coexist with non-peaceful contest and clash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ure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e. indigenous Turki-Islamic-Russia element, and non-native Russian culture, the Islamic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will last a long time in the Central Asian area. As an attributing center, Central Asia will b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major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for a long time. Also it will be a long and step by step process for China to maneuver its influence. Due to geopolitical advantage, this influence will be unavoidable. Simoutaneously, Central Asia society will develop quicker and stronger under these pressures, finally improves its own compet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n Society, cultures and social forces

Résumé: Pendant le processus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de l'Asie centrale (la société après l'effondrement de l'URSS), les facteurs internes et externes de la culture turque, islamique et russe et occidentale se mesurent, s'intègrent et s'opposent. La société de l'Asie centrale, en tant que centre de diffusion de toutes les forces culturelles, restera pendant longtemps sous l'influence de ces quelques forces culturelles. La mise en fonct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Asie centrale sera un processus long et progressif. De même, la société de l'Asie centrale sera trempée sous l'influence et la pression de diverses forces culturelles de l'extérieur, et ainsi améliore-t-elle rapidement ses propres capacités de survie et de compétition dans le futur développement du monde.

Mots-clés: la société moderne de l'Asie centrale, la force externe de la culture

摘要: 在現代中亞社會（蘇聯解體後的中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本土的突厥語諸民族文化、伊斯蘭文化、俄羅斯文化等因素和三者的結合體突厥語諸民族-伊斯蘭-俄羅斯文化因素，以及非本土的俄羅斯文化、伊斯蘭文化、西方文化和突厥語諸民族文化等因素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扭結、較量和衝突在一起。作為各種文化力量的集散地，中亞社會因此將在較長時期內處於這幾大文化力量的影響當中。而中國文化在中亞發揮作用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同樣，中亞社會將在這諸多外部文化力量的影響和擠壓下使自己得到鍛煉，從而迅速提高自身在未來全球發展中的生存和競爭能力。

關鍵詞: 現代中亞社會；外部文化力量

蘇聯解體，中亞社會進入後俄羅斯化時代發展階段。的確，蘇聯解體以來，中亞社會走上了另外一條全新的國家建設道路，整個社會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無疑已處在多種文化力量的作用之下。在影響中亞社會內部發展的諸多因素中，民族人口數量居多的突厥語諸民族與伊斯蘭文化因素以及對中亞現代化影響最深的俄羅斯文化因素三者將發揮最重要作用。這三種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已結合為一個相對穩固的文化共同體，影響著中亞社會各國的內政建設、對外關係和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的決策方向和發展動態。而在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發展的諸多外部文化力量因素中，最重要的不外乎突厥語諸民族文化、伊斯蘭文化、俄羅斯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等因素。下面我們將從這幾個方面分別予以論述。

1. 突厥語諸民族文化力量因素

在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發展的諸多外來文化力量因素中，作為以操突厥語民族為主體民族的中亞各獨立國家（塔吉克斯坦除外），外來突厥語民族文化力量因素對其產生影響，無論是在民族感情上還是在經濟需求上都是情理之中的。

首先，可以對中亞社會的發展產生最大影響的外來突厥語民族因素是來在土耳其的文化力

量。這是因為，土耳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突厥語國家，同時它也是伊斯蘭世界中同西方世界聯繫最為緊密的國家，代表著伊斯蘭世界世俗化與現代化發展的方向。“新獨立國家建立之初，蘇聯‘突厥人’在土耳其那裏找到了他們所必須的一切。國家意識形態、金錢、穆斯林社會建立世俗國家的經驗、同西方的聯繫、滿足國內需求的商品。90年代初土耳其對我們大家來說顯得非常重要。”¹

第二，土耳其宣導的泛突厥主義思想具有極強的誘惑力和鼓動性，曾一度引發中亞各獨立國家的熱烈響應；在增強操突厥語諸民族自信心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曾一度成為來自外界突厥語世界的最強音。

第三，在影響中亞社會發展的外來突厥語民族文化力量因素中，還有一種影響力需要密切關注。那就是因中亞操突厥語諸民族國家的建立對周邊多民族國家操突厥語諸民族造成的心理震撼而對中亞社會產生的反作用力。這其中尤以來自周邊國家的某些分裂主義活動表現最為突出，是影響中亞社會正常發展的負面因素之一。

儘管土耳其在中亞各國獨立之初，也可以說是在整個90年代，扮演了替代前蘇聯老大哥的那種角色，但是它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到底能

¹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Наш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из Стамбула?" Континент. 27 ноября-10 декабря 2002. №23(85). с.19.(我們的伊斯坦布爾老大哥？//大陸)

不能繼續扮演這種角色並發揮更大的作用還值得懷疑。這是因為：

第一，無論從領土面積、人口數量，還是它的民族淵源、²經濟發展水準看（儘管在突厥語國家或伊斯蘭世界中位居前列，但是同歐洲國家相比仍然非常落後），這些都決定了它對突厥語國家的支持或幫助是非常有限的。顯然，它沒有太多的金錢，而老大哥是需要無償付出的。

其次，土耳其本身無論是在國家建設、意識形態體系、對待伊斯蘭世界的態度以及經濟等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90年代初直至現在它一直是‘歐洲病夫’”。土耳其——這是一個腳踩兩隻船的國家（原文為坐在兩把椅子上的），其人民在東方因傾向西方而不受尊重，在西方則因其東方傳統而不受歡迎。事實上這是土耳其的悲劇，這種悲劇在非常早的坦奇馬特時期³就已開始，之後在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時代繼續下來。而且，在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兩者之間疏遠和不理解波濤洶湧的今天，土耳其正好處在它們當中，宛如置身構造的斷口上。”⁴因此，日後的土耳其還得為自身諸多問題的解決付出巨大的能量，這必然會限制它向外輸出思想的潛力。

另外，在土耳其語中，“突厥人”和“土耳其人”是同一個詞。因此，在其新聞媒體的任何報導中，所謂的“突厥世界”或“突厥國家”都混同為“土耳其世界”或“土耳其國家”。從表面看，這“只不過是術語和翻譯的問題。但是問

題在於，這裏卻強加了強大的意識形態炸彈”。顯然，土耳其人想當突厥語世界首領的願望昭然若揭。“是的，每一位土耳其人都是整個突厥（土耳其）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同時它又是土耳其的一位公民和土耳其民族國家的組成部分。因此對他來說土耳其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其他所有突厥人的利益則是次要的。‘真正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不能不對全世界突厥人（土耳其人）的生活感興趣，但是在政治舞臺上他們的努力則僅限於自己的祖國’”。 “一方面，他們（土耳其人）就像前總統厄紮爾一樣，幻想將所有的突厥民族統一到以土耳其為首的一個國家內部。同時，另一方面，在涉及土耳其本身時他們又把所有其他突厥人看成次要成分。” “例如，在我們哈薩克斯坦，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在社會意識中的人氣指數很低，尤其是在哈薩克人當中。誰都不會為自己被看作次等的“土耳其人”，抑或是偉大的突厥集團的成員而感到高興。原則上只有非常短視的人才會被有關建立土耳其占主導地位的突厥聯盟的動聽空談所矇騙。”⁵

總之，儘管土耳其人有把全世界操突厥語諸民族聯合起來的“偉大”願望和思想，但是其自身的實力和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民族心理（既野心勃勃，又心存狹隘）使得它在現代中亞社會或突厥語世界的發展中無法充當更重要的角色，更不要說“老大哥”這樣的角色了。因此，簡而言之，泛突厥主義思想也不過是個動聽的口號而已，而真正的意圖則是為土耳其自己謀利。“在這裏（獨聯體各國）它可以靠著同地方上層的非官方密切關係輕鬆地撈到錢。而後再次努力設法擠入西方，利用在獨聯體獲得的資本深入複雜的歐洲市場。因此土耳其人思想中有關突厥人（或土耳其人）統一的一切動聽的空談聽起來都是虛假的”⁶

可見，土耳其、土耳其人，以及它所宣導的泛突厥主義思想在現代中亞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將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泛突厥主義思想還會在操突

² 土耳其民族是奧斯曼帝國毀滅後由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按照歐洲民族國家建立的方法（即摒棄其他名稱，只保留法國人或德國人這樣的稱謂的做法）如法炮製的一個新民族。它是被共同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曾在奧斯曼帝國轄下皈依了伊斯蘭教的諸多民族，如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等民族的複合體。事實上他們同昔日某個時候來到小亞細亞的突厥民族有很大的差異。

³ 1839年11月，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1839-1861在位）為擺脫帝國瓦解的危險，頒佈坦齊馬特口諭，宣佈帝國臣民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其生命、財產、名譽均受保障等原則。於是，帝國在穆斯塔法·賴希德帕夏（1800-1858）領導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制定刑法、商法等法典，召集地方代表會議，推行世俗教育體制等。1856年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再次下詔，重申改革的決心。但是，帝國的這些改革收效甚微，相反卻擴大了西方列強在土耳其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奧斯曼帝國對列強的政治經濟依賴日益加強。這一時期就是奧斯曼土耳其的坦奇馬特時期。

⁴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Наши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из Стамбула?*” Континент. 27 ноября-10 декабря 2002. №23(85). с.19. (我們的伊斯坦布爾老大哥？//大陸)

⁵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Наши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из Стамбула?*” Континент. 27 ноября-10 декабря 2002. №23(85). с.19. (我們的伊斯坦布爾老大哥？//大陸)

⁶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Наши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из Стамбула?*” Континент. 27 ноября-10 декабря 2002. №23(85). с.21. (我們的伊斯坦布爾老大哥？//大陸)；同時可參閱王治來：論說所謂“土耳其斯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第85-89頁。

厥語諸民族心理深處長期存在並延續下來，在某個時候有可能再次復興或發展，當然這種泛民族主義思想也會引起周邊其他國家，如俄羅斯、中國等國家的反感。

另外，前文已述及，因中亞各民族（主要是操突厥語諸民族）國家獨立而對周邊多民族國家某些少數民族（操突厥語民族）造成的民族心理震撼，及由此而引發的某些分裂主義浪潮同樣也會反作用於中亞社會的發展。9·11 事件之前，源自中國境內的某些分裂主義思想及其活動曾一度受到中亞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在中亞曾出現各種分裂政黨積極活動的局面，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巨大壓力，成為中國同中亞各國關係發展中必須解決的焦點問題。

9·11 事件爆發，反恐、反分裂成為國際社會乃至中亞各國的普遍共識，活動於中亞地區各種分裂中國的分裂主義分子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遏制。當然，這種分裂因素既包含著民族因素也包含著宗教因素，從民族心理角度考慮則主要是受中亞操突厥語諸民族國家的獨立及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鼓舞了”極個別具有分裂主義傾向的個人或組織起來為所謂的“民族自決和獨立”而“奮鬥”。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這種因中亞各國獨立或泛突厥主義思想輻射而產生的民族“自決或獨立”情緒還會大有市場。

但是，毫無疑問，如果與中亞各國相鄰的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因分裂主義活動而出現不穩定的局面，中亞社會同樣也無法避免遭受嚴重的衝擊。因此，消除因蘇聯解體、操突厥語諸民族國家獨立而引發的來自外界的負面反作用力，同樣也是中亞各國需要慎重考慮和採取明確態度對待的一個問題。毋庸置疑，以上這些因素同樣也是現代中亞社會發展中一個長期潛在的重要影響因素。

2. 伊斯蘭文化力量因素

顯然，在影響中亞社會發展的外來文化力量因素中，伊斯蘭因素要比突厥因素強大得多，而且突厥因素中的土耳其本身就是伊斯蘭國家。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在恢復民族傳統文化的建國思想指引下，各種宗教思潮迅猛發展，其中尤以

伊斯蘭教的發展最為突出。這首先是由內外兩方面的需求造成的：內部需求指的是，蘇聯解體，原先奉行的無神論思想不復存在，人們需要在精神領域找到自己的信仰，對於國家來說也急需實實在在的可以歸整人們心靈和行為的“處方”。外部需求指的是，各伊斯蘭國家都想把帶有各自政治目的的宗教思想傳播到這些昔日“真空”地帶，以增加其在這些國家施加影響的潛力。

對於任何政黨抑或國家權力新貴來說，在未取得政權之前可以借推翻舊勢力或舊政權的反傳統口號獲得民眾的支持，但是當它一旦取得成功並成為新的權力主人之後，儘快恢復社會秩序，規範人們的行為方式，包括道德的重建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傳統文化（包括宗教文化）顯然具有極其強大的“功效”。中亞各國獨立後，同樣面臨著一個在否定前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後規範人們道德行為，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任務。儘管法律具有強大的約束力，但是在提高人們道德水準方面，顯然它還無法同傳統文化的功能相提並論。

我們認為，規範人們行為的“處方”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自律”，即來自內部的道德與修養的約束，另外一種是“他律”，即來自外部的法律與制度的約束。如果一個社會能夠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和實現國家的法制建設則必定可以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局面。顯然，在提高公民道德修養並進而規範社會秩序方面，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抑或伊斯蘭世界，傳統文化思想（如中國的儒釋道思想、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蘭世界的伊斯蘭教）具有現代學說不可替代的重要而穩固的作用。當然，這些傳統文化思想並不總是排斥現代思想學說，相反它們始終也在不斷地改變和完善自我，借鑒和吸收一切有用的東西。

事實上，獨立後的中亞各國既面臨著放棄無神論思想後填補信仰真空的需求，同時也面臨著脫離前蘇聯法制軌道後建設法制國家的任務。伊斯蘭世界對於中亞各國的影響顯然主要聚集在前者，但是，至於各國選擇接收來自外界的哪種伊斯蘭教思想或派別則需要時間和過程，當然也同外界伊斯蘭國家“輸出”伊斯蘭教思想的實力和力度密切相關。

從我們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把伊斯蘭世界分為如下幾種主要的國家類型：第一，土耳其，集突厥語民族、現代化、世俗化等因素於一身的

伊斯蘭國家。正如上一節的論述，土耳其作為蘇聯解體後在中亞地區發揮過重要影響的國家，儘管其影響力因自身國力、民族性格以及周邊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在中亞影響力的不斷加強而有所減弱，但是它作為現代化和世俗化相對“成功”的伊斯蘭國家典範，在很多方面還有中亞各國值得效仿的地方。顯然，在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發展的諸多因素中，土耳其因素仍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土耳其伊斯蘭因素對中亞的影響將始終同其本身所固有的突厥語民族文化因素和近代以來取得的西方世俗化成果因素相伴相隨。

第二，伊朗，政教合一的什葉派伊斯蘭國家。70年代末期的伊朗伊斯蘭革命結束了近代伊朗步土耳其世俗化後塵的歷史，重新進入了政教合一時代，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政教合一國家。90年代，伊朗借著中亞各國獨立之機，同樣也在中亞地區極力拓展自己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空間，並且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是，無奈由於自身經濟發展水準所限，加之中亞各國都明確提出致力於創建政教分離的法制國家，因而伊朗伊斯蘭思想的輸入不可避免會受到限制。而且，20來年的非世俗化運動並不能解決伊朗的經濟發展問題，同時在美國等國的經濟制裁和遏制下，伊朗的綜合國力沒有出現明顯的改善，這成為影響其在中亞拓展空間的最大障礙。要知道，中亞社會上層對於金錢的需求遠比對伊斯蘭教的需求迫切和強烈得多。因此，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要在中亞施加更大的影響，現實需求的滿足，即金錢的投入，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更具份量。在這一點上，伊朗顯然“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三，沙烏地阿拉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主要以瓦哈比派為主。沙特作為世界石油大國，它完全可以有能力在中亞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但是現代中亞社會非常清楚政教合一國家建設思想及付諸實施的消極之處，因此這可以說是沙特伊斯蘭因素在中亞施加影響的致命弱點。

第四，阿富汗，處於戰亂和曾一度以輸出遜尼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主的國家。9·11事件之後，這種宗教極端主義的載體塔利班政權基本被摧毀，中亞地區受這種伊斯蘭思想的影響將有所減弱，但決不能說已經消失。當國家處於穩定的發展狀態下，這種極端思想往往會受到有效遏制；反之，當國家處於混亂狀態下，這種思想則會迅猛發展，不但殃及一個國家還有向外輸出的

趨勢。

總之，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這些國家將根據各自不同的需要源源不斷地將伊斯蘭教思想輸往中亞各國，成為他們對中亞各國施加影響的重要籌碼。換言之，儘管外界“輸入”中亞的伊斯蘭教形式各異，但總歸都是伊斯蘭因素在起作用。

另外，在影響中亞社會發展的諸多伊斯蘭因素中，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在中亞的影響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消極因素。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中亞宗教思想復興的大氣候下，這些思想必定有其發展和傳播的市場與途徑。

總而言之，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外部伊斯蘭因素將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和途徑不斷尋找自己的立足點和發展空間。事實上，這是一種既現實又潛在的巨大影響力量。

3. 俄羅斯文化力量因素

無論是從地緣優勢還是人文優勢看，來自外部的俄羅斯因素仍然是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的強大一元。它對中亞的影響往往會通過其內部的俄羅斯因素表現出來，畢竟長期的俄羅斯化影響已使中亞的俄羅斯族成為繼當地主體民族之後的第二大民族（當然在各國的比例有所不同，但基本都處於第二的位置）。相同的民族認同心理使得中亞的俄羅斯族同俄羅斯的命運始終是聯繫在一起的，何況中亞各族民眾在許多方面根本無法或不願意放棄俄羅斯帶給他們的現代化影響，尤其表現在思維慣性上。俄羅斯仍然是中亞社會現代化發展方面重要的原生輻射地之一，儘管西方的影響力在逐漸加強，但是俄羅斯在中亞的長期影響已使他們更多地習慣同俄羅斯打交道。

首先，語言影響思維。在中亞各國，儘管國語的推行佔據了主體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地位，但是，迄今為止收效相當有限，俄語仍然是事實上的第一大語言。無論是在國家間的交往、科學技術發展中還是在民眾的溝通中，人們的普遍思維方式仍然是俄語的思維方式。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語言的改變是一個非常非常緩慢的過程，俄羅斯人把俄語帶入中亞並基本得到普及花了很長時間（這還包括強制推行在其中），顯然，在中

亞各國不感冒然強制推行國語的情況下，很難說國語的發展會在短時間內有取代俄語的現實可能。況且，一種語言的推行往往還得借助其文化的整體素質來施加力量，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主體民族語言所表現的各類文化顯然還無法同俄羅斯文化相提並論。事實上，這是主體民族國語推行中致命的弱點。因此，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來自外部的俄羅斯因素仍然可以借助其內部的俄羅斯因素對中亞社會施加巨大的影響。

其次，俄羅斯族在中亞社會的存在，也是俄羅斯因素保持對中亞施加影響力的最重要的實實在在的力量，這是俄羅斯文化在中亞的活載體。

還有，從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上分析，中亞社會無論如何也囊括在俄羅斯的傳統利益範圍之內。而且，西方勢力進入中亞勢必會影響到俄羅斯的利益，這也是刺激和促進俄羅斯在中亞加強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俄羅斯作為東西方文化的兼得者，它既會通過東方式的漸進的思想影響方式對中亞施加影響，同時在必要的時候，它並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以抗衡其他勢力並進而推行自己影響的做法。顯然，俄羅斯在普京任期內先後甩掉越南的金蘭灣和古巴的魯爾德斯兩個軍事基地之後，於 2002 年在吉爾吉斯斯坦康特開關其現代史上第一個軍事基地，這件事本身就說明問題⁷。

最後，來自中亞周邊地區的伊斯蘭因素（主要是宗教極端主義）和突厥因素（主要是泛突厥主義）也是促使俄羅斯在現代中亞加強影響的重要刺激因素之一。俄羅斯在 9·11 事件發生後能做出支持美國的快速反應，主要還是考慮到可以借美國之手清除影響獨聯體南部安全體系的塔利班宗教極端主義；事實表明，這一目標基本達到。但是，宗教極端主義隨時都有可能再次復興，俄羅斯不可能不對此做出反應。另外，土耳其宣導的泛突厥主義早已引起俄羅斯的反感，俄羅斯曾於 2000 年警告土耳其不要效仿阿拉伯國家聯盟創建突厥語國家聯盟，這一點說明俄羅斯不會坐視有損其利益的任何舉動。

當然，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還需要注意另外一種同俄羅斯因素相關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與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在中亞內部同樣也

會產生俄羅斯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中亞的俄羅斯族地位在進一步下降或受到“歧視”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要求提高其地位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如果這種思想一旦形成，則很容易同來自外界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相結合，成為“為其民族利益而鬥爭的中堅力量”。另外，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思想曾在俄羅斯的對外擴張中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顯然，這種思想並沒有從俄羅斯領土甚至中亞領土上消失。這種思想既會在俄羅斯勢力強大時復興，同樣它也會在俄羅斯勢力萎縮時出現。

總之，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由於其自身現代化的畸形特徵使然，使得它還得長時間依賴俄羅斯，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俄羅斯因素的影響。顯然，來自外部的俄羅斯因素將通過中亞已有的俄羅斯因素，即傳統的文化力量，繼續對中亞施加持久的影響。外界西方、伊斯蘭和突厥語諸民族等文化力量因素在中亞的存在，也會刺激俄羅斯因素在中亞自覺或不自覺的加強。2002 年俄羅斯在中亞開闢軍事基地已經證明俄羅斯無意放棄在中亞的軍事影響。另外，來自俄羅斯內部潛在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也有可能推動俄羅斯因素繼續在中亞保持存在。

4. 西方文化力量因素

西方因素對現代中亞社會產生影響可以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直接進入，另一種是以“變種”的形式進入。

9·11 事件偶然地促使美國完成了對中亞的直接進入，使中亞社會同西方文化力量之間出現了直接對話的地緣優勢。這首先表現在美軍已在中亞開闢了三個軍事基地：哈納巴德（烏茲別克斯坦）、馬納斯（吉爾吉斯斯坦）和庫利亞布（塔吉克斯坦）。這些初步的“成就”將成為西方在中亞繼續拓展政治、經濟和文化空間的基礎。顯然，西方文化的特質決定了它決不會就此止步，“人類正在期待一個怎樣的未來？今天要回答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現代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利堅合眾國的行為方式。美國不僅在軍事、經濟、科學技術和資訊方面超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而且從根本上決定著國際關係，影響著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確定著整個星球的政治氣

⁷ См. Султан Акимбеков.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Джебдея. Континент. №24(86) 11-24 Декабря 2002. с.4.(俄羅斯返回中亞//大陸)

候。”⁸

此處所謂的“變種”形式是指在現代人類社會中西方文化力量因素無所不在，無論是伊斯蘭世界、突厥語世界還是俄羅斯、中國，無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這諸多因素的進入也就意味著同時裹挾著西方文化在其中。例如，在突厥語諸民族和伊斯蘭因素中尤以土耳其表現得最為突出，而俄羅斯因素本身就是東西方文化的結合體，分析中國文化及社會發展的軌跡，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中國文化正處在同西方文化進一步結合的時代。這裏尤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這三者中土耳其是作為西方文化代言人的姿態在中亞出現的。

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里海豐富的油氣資源、遏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現實需要，以及後來出現的反恐戰爭需求，無不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對這片土地產生興趣。進入中亞“真空”地帶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在全世界的勢力範圍，獲取更多的霸權資本。控制中亞和西亞也就意味著控制波斯灣與里海豐富的油氣資源，美國借著反恐之際在中亞實現駐軍，從而可以在進一步的空間拓展中實現對里海石油圈的包圍。如果美國想方設法徹底摧毀伊拉克，則既可以控制波斯灣石油又可以控制里海石油。

另外，美國在中亞駐軍即意味著完成了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全方位包圍和“監控”，當然這也是促使俄羅斯於 2002 年中亞開闢軍事基地的重要原因。可見，軍事基地的存在將加強西方因素和俄羅斯因素在中亞對抗和對話的力度，兩者將在這種對抗與對話的互動關係中進一步加強對中亞的影響力度。美國駐軍已成實事，因此周邊各國在被迫承認實事的基礎上積極地利用其力量實現對分裂勢力或恐怖勢力的遏制，這也是彙集於中亞地區各種因素實現合作的重要基礎。

西方軍事力量的現實存在顯然增加了它在中亞開拓勢力空間的份量，這是西方世界慣用的但同時又是最有效的一種施加影響的方法。而且，“以九一一事件為代表的全球性動蕩，將戰後半個多世紀形成並趨於穩定的國際秩序推向懸崖絕壁，進而對人類文明走向構成挑戰。同時，各種

立場的思想家也試圖以理論思維對過去和未來的世界走向進行勾畫。這一切，易令人想起上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社會的‘思想萬花筒’現象：軍國主義、權威主義、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思潮，就像從潘朵拉盒子放出來的惡魔，在人們眼前來回飛舞，最終導致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動蕩。過了百年，情景如此相似，令人驚訝。”

“冷戰結束以後，尤其是隨著‘九一一’後國際秩序的大幅度傾斜，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作為民主和自由的輸出手段，又開始在新的世界框架下找到市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首相布雷爾的外交政策顧問、資深外交官羅伯特·庫珀的“新帝國主義思想”，下邊還要引用他的思想——本文作者注）。近年來不斷明顯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客觀上成為這股思潮的基礎和推波助瀾的因素。⁹”顯然，西方文化價值觀中的開拓性與殖民性特徵自古至今始終貫穿在其社會的發展進程當中，這是其不變的追求；因此，在中亞開拓勢力範圍也在“情理之中”。

當然，中亞的現實需求，即對西方民主與資金的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迎合了西方對外輸出文化精神和獲得現實利益的需要，這使得雙方將在日後的發展中更多地考慮互動合作；而且中亞社會也將在西方、伊斯蘭、俄羅斯和中國等因素之間尋求平衡和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因此也會成為各種因素在中亞增加說話力度的衡量器。從這個角度出發，西方社會具有強大的資金和技術作後盾，顯然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和誘惑力。

9·11 事件後，美軍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既突現出了大國霸權主義的本色，而且，毋庸置疑，在美國花了整整 10 年的時間打破中亞地區的權力真空狀態之後，中亞社會將進入真正的多種文化和社會力量集散的時代。西方因素自身所具有的開拓與殖民精神決定了它不會安於現狀；它需要挑戰，它需要在挑起的混亂中尋求利益。無疑，中亞地區將是它又一個尋求機遇和利益的重要場所。況且西方世界推動創建“新帝國主義”的思想也正在悄然興起。正如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認為：“隨著美蘇對抗結束，勢力平衡這一國際關係形態已走到盡頭，人類現在到了迫切建立新帝國的時代”；“新帝國主義符合人權

⁸ А.И.Уткин.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для XXI ве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Логос», 2000. с.2. (21 世紀的美國戰略)

⁹ 邱震海. 英國謀士推動新帝國主義. *亞洲週刊*, 2002 年 4 月 22 日-4 月 28 日, 第 26 頁.

要求和世界性價值觀，可對歐洲後現代大陸以外的‘失敗國家’（如阿富汗等）行使武力、先發制人攻擊等粗暴手段。¹⁰顯然，這一思想正好可以為西方大國的霸權主義行動找到“合理”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印證了我們對西方社會及其文化特質的論述。¹¹

5. 中國文化力量因素

中國文化力量之所以可以在現代中亞社會發揮作用，首先，蘇聯解體、中亞獨立，原先被阻斷的文化傳播通道再次暢通，這是中國文化可以外漸的客觀條件；其次，中國已基本擺脫了近來以來屈辱的歷史，自身正在經歷由“破”而“立”的重大變革¹²；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民族自信都在進一步提高，這是中國因素可以外漸的先決條件；還有，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豐富內涵在新時期又顯示出了其無窮的魅力；最後，中亞地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方面出現的地緣優勢，成為中國因素可以對其產生影響的又一重要因素。

儘管蘇聯解體使中亞周邊原本不太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變得複雜起來，但是，在整個近代以來被俄羅斯阻斷的陸路通道卻因此而得以暢通，這不能不說是個意外的收穫。而且，中亞出現五個獨立國家，顯然對正在發展中的中國來說，要比直面相對一個“強大”蘇聯的壓力小得多；事實上，中亞地區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緩衝地位的角色。總之，蘇聯解體給人類目前最重要的幾種文化力量在中亞進行交流提供了機遇和場所，而中國正好也處在國力上升、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重要變革時代。顯然，這種機遇對它來說來得正是時候，內外條件均決定它將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中國在世界影響力的提高正在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好奇和深入探究，當然中亞也

不例外。但是，就中亞來說，對中國的瞭解也只能說正處在由“獵奇”階段向深入階段的過渡時期。這其中首先表現在“漢語熱”、“風水熱”、“氣功熱”、“功夫熱”或“成龍熱”，其次表現在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和現代國家建設的研究上。關於“漢語熱”，在中亞各國生活過的人都會有強烈的感受。這股漢語熱潮已成為中亞高校教育的一個亮點，各高校紛紛開設漢語言專業，物色漢語教師。至於“風水熱”、“氣功熱”等，首先給我們的第一影響就是各類書店中陳列著的大小、五花八門的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如風水與人生、風水與和諧、風水與裝修、風水與生意、氣功與養生等等。當地學生認為，風水決不同於迷信，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學說或思想。至於“功夫熱”主要表現在青少年對香港影星成龍及其所飾演影片的熱衷上，認為那就是中國功夫或武術，而且幾乎都可以模仿兩、三下。

另外，對中國傳統學說和思想的研究正在不斷深入，關於這方面的書籍也是非常之多，幾乎每個書店均有銷售。而且我們在同當地學生的交談中也可以感覺到，他們對於孔子（或儒家思想）的瞭解與尊重顯然超過了中國學生。當然，中亞地區以上這種種有關中國“熱”的書籍主要來自俄羅斯，儘管價格不菲，但銷路並不差。這種現象說明，中國因素正在受到中亞民眾的關注與重視，無疑其影響力正在逐步上升，這還不包括中國商品對中亞社會的“衝擊”與貢獻。

當然，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由於中國目前正處在自身調整的大變革時期，中國輸往中亞的商品品質、中國在中亞的人員素質、中亞流行著的“中國威脅”論、來自中亞地區的分裂主義論調等等，都會對中國因素在中亞地區的交流與發展產生消極影響。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明確要傳播什麼樣的文化，切入點是什麼，我們認為，這才是致命之所在。

儘管有跑題的嫌疑，但本人覺得還是有必要就自己的觀點略作論述。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文化與社會的大繁榮期到來之前，一定會出現本土文化，即傳統文化同外來文化的大融合與大交流局面，而且傳統文化同外來文化的結合並不矛盾。如若只注重傳統文化的回歸，則勢必陷入保守和自我封閉之中；這是因為，中國文化及其載體中國人的弱點就是缺乏西方、俄羅斯和伊斯蘭

¹⁰ 邱震海，英國謀士推動新帝國主義，*亞洲週刊*，2002年4月22日-4月28日，第26頁。

¹¹ 參見汪金國，影響未來中亞社會發展的文化和社會力量因素，*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關於該問題的論述。

¹² 參見汪金國，影響未來中亞社會發展的文化和社會力量因素，*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關於該問題的論述。

等文化傳播的“主動”精神。如果一味地蔑視傳統文化（毫不誇張地說，大多數人仍然還持這種態度），則有可能導致文化斷層，深陷不知自我之窘境。“凡對以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籍過去乃可認識現在，已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實有真實之改進。”¹³“過去我們愛講祖國的博大精深。我以為，一個民族的博大精深，要看你現在的這一代人，對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是不是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和自豪，是不是有強烈的文化自尊。如果沒有，就談不上博大精深。我們的歷史是博大精深的，但如果一個民族的歷史，不能變成這一代人的精神財富的時候，那麼我們只能說是一個失落的文明。經濟的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但是在國際化背景下，文化的本土化也是一股世界潮流。各國的文化都在向著自己的本土化方向發展，這是一個發展趨勢。關鍵是看我們自己如何把握，一個民族，如果自己的文化還處於很零散，很微弱的狀態，沒有摸清，無法把握，更談不上引以為自豪和驕傲，那麼就很容易在國際化背景下失去自己，就很難形成真正的民族凝聚力。”¹⁴那麼就更談不上向外傳播自己的文化了。事實上我們自近代以來一直還處於這種文化的迷途之中，僅從最簡單的對語言文字的態度和做法就可看出這一點（參見注釋中本文作者對漢字簡化和文言文實際廢除的看法）。¹⁵因此，改變

國人對傳統文化嗤之以鼻的態度便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當國外就有關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專著一本接著一本出版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從自己的文化偏見中走出來。而且，重要的是，“文化傳統並非身外之物可隨意拋棄。文化傳統來自地域、語言、社會結構、社會生產方式、心態民俗及原始概念等因素。它長期積累，潛入生命，積澱于民族心理結構之中，因而傳統文化在現實中國社會發生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¹⁶

無論是從歷史的還是現實的角度分析，我們認為，**由衷地崇尚和發揚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真誠地尊重和吸納外來傳入的先進文化**，這是自古至今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長盛不衰和我們今天仍然應該信守的公理。同樣，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無論中國文化在同中亞已有的文化還是外來多種文化的交流中，在施加自身文化影響的同時，無疑也可以借鑒和吸收許多我們所不具有的有益成份；因此，加強文化交流傳播的主動性則顯得非常重要。這是因為，“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發展過程中，必須互相學習，互相充實，互相繼承，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規律。學術文化是人類共同享有的，每一民族必須向別人學習，也必然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歷史上絕對沒有任何民族，在文化上專門引進，毫無創造；

問題盡在，首代人繁簡均可識，二代識繁漸少，識簡漸多，三、四、五代乃至更遠，識繁愈少，甚或不識，等到有朝一日需要返回尋找文化之傳統，無疑考古猜字，識讀天書（如西夏文之命運）。今日西方文化，勢如破竹，西方語言文字，亦隨之長驅直入，吾等並非排斥西方文化之輩，但在傳統文化方面，中國實屬優秀文化之邦，如因文字而失之，無法不令人痛惜。此有一例，甚可說明問題：韓國文字之簡化（全面拼音化），其害已顯，年輕一代已幾無人可識漢字，欲找傳統，翻讀史書，談何容易，此舉已引起韓國人之悔悟！前車之鑒，理當警記。如若將作為中華文化碑石之文字肢解，豈能容得傳統文化之傳承。此就漢字簡化談及幾句。餘可斷言，漢字簡化到此為止，尚存傳承中華文化之功能；如若像韓人全盤拼音化（或拉丁化），中華文化無疑將在幾代人（僅僅幾代！）身上斷卻“香火”，淹入歷史洪流之中，消失殆盡。餘下論及文言之廢。毫不誇張，中華文化之一切精華盡在文言之中。文言之廢，其害日現。害一，經典之作漸趨無人可識，精華難以存續；害二，割斷古今對話，實乃文化之真正阻斷；害三，今白話之文，洋洋千萬言，不只所雲者甚多，廢者甚多，環境堪憂。文言之廢，其弊如此，作文亦難，修史亦難，終致做人亦難，處世亦難，世風日下，在所難免。（2001年6月12日）

¹⁶ 郝俠君，毛磊，石光榮主編。《中西500年比較》。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第758頁。

¹³ 錢穆著。《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版，《引論》第2頁。

¹⁴ 劉東平。“搶救民間文化，關注民眾精神”——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作家馮驥才訪談。今日中國，2003年第2期，第68頁。此為馮驥才語，儘管此處談的是有關搶救中國民間文化的事，而且本文作者並不完全認同談者所謂文化本土化的觀點（顯然，談者並未完全領會中國文化的博大“胸懷”，但是談者對於文化的某種責任感和某些看法還是有可取之處，故引用之。

¹⁵ 此為本文作者對漢字簡化和文言文實際廢除（儘管沒有明文規定）的一些簡單思考，此處需要申明兩點，一，這只是個人想法，僅供思考，並不強求所有的人都這樣理解；二，本人並不是一個頑固不化的保守者。“漢字簡化之初衷，皆為普及文化；今觀之，其弊日顯；文化之普及遠不在一字之上少寫一筆兩筆，相反，漢字之簡化，倒入今日之減肥吸脂，其弊大焉。弊一，漢字之簡化，使其多數無法尋回原有一眼可識之真意，即原始之意、根基所在（尤其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學習者寫一個漢字無疑在造一座空中樓閣，不知道理何在）；弊二，人為造成簡體與繁體之鴻溝，是普及文化還是阻礙文化，一目了然；弊三，原有漢字自秦一代綜合當時多國優點所創，一脈相承，脈絡清晰可辨，而現代漢字之簡化，卻難避心血來潮之嫌。

也沒有任何民族，專門創造，毫無引進”。¹⁷更何況，從地緣政治利益出發，自古迄今“中國政府在天山南北之活動，直接影響於中亞細亞，而中亞細亞人民對中國之叛服，亦直接影響於天山南北之安危。若以國防言之，天山南北為中國之城垣，中亞細亞則為中國之外郭”。¹⁸由此，加強中國同中亞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增強文化傳播的主動性，具有現實和長遠意義。

總結以上各種論述，我們看到，中亞各國獨立以來，都把恢復和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作為一項重要的國策而付諸實施，因此在其現代社會的發展中，借鑒外來突厥語國家相對成功的發展經驗便具有比較現實的意義，而在突厥語國家中土耳其可以算是影響力最大，社會發展相對成功的一個國家。另外，在突厥語諸民族因素的影響中，還存在著極具誘惑力的泛突厥主義思想和受中亞操突厥語民族國家獨立“鼓舞”，而在多民族國家內部掀起的某些分裂思潮，也將在很長時間內對中亞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也許更多的是負面影響。

其次，在現代中亞社會的發展中外來伊斯蘭因素對它的影響將是長期的，同突厥語諸民族因素相比伊斯蘭因素的影響顯然要大得多。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對中亞長期而負面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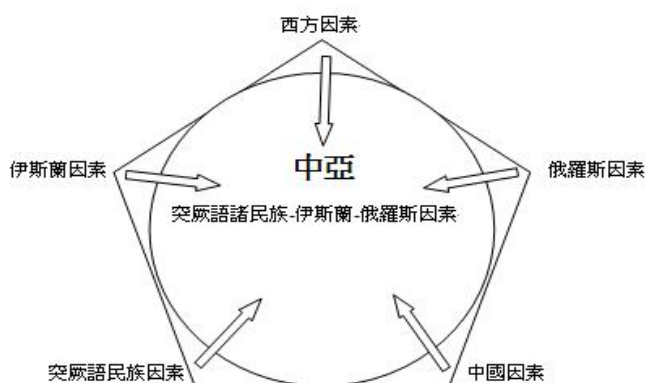
還有，作為在中亞社會內部長期存在的俄羅斯因素（儘管以俄羅斯化的形式出現）並不會因蘇聯的解體而消失，相反只會沉澱並積存下來，同來自外部的俄羅斯因素一道對中亞社會的發展產生作用。當然，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有可能在某個時候再次復蘇的大俄羅斯主義、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等思潮。

西方因素作為目前影響力最為強大的一種因素，它的影響無處不在，而且是全方位的。在中亞所謂的公民社會建設中，其國家建設、經濟發展等諸多方面都需要借鑒西方的經驗，這種來自內部對西方文化的需求和來自外部對中亞利益的渴望使得兩者不拍即合。只是這裏不能不提防來自西方世界，尤其是當代美國大國霸權主義對中

亞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國因素作為曾在歷史上對中亞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因素，為中亞地區歷史人文背景的塑造做出過非常重要的貢獻，蘇聯解體給它一個再次發揮影響力的機會。而且從目前的情況看，這種影響力正在逐漸上升，中亞社會內部對中國瞭解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強；從地緣優勢分析，這種影響將是持久的和互動的。只是目前我們還處在自身文化的重新審視和再認識階段，尚不知道以傳播什麼樣的文化為最好的切入點。只是，無可爭辯的是，同現代化相結合的傳統文化思想的傳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總結如上論述，我們可以把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發展的諸多外來因素用下圖直接明瞭地表示出來。¹⁹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十五”規劃第一批研究專案(01850001)階段性成果之一。關於影響現代中亞社會發展的內部文化力量因素，已另有專文論述，可參見《東歐中亞研究》2004年第2期。

作者簡介:

①Wang Jinguo (汪金國), 1971 年出生。中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世界史博士後流動站，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中亞和世界民族研究。

②Zhao Yigang (趙義剛)，蘭州大學。

通信地址：①Wang JinGuo,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730000, P.R. China.

② Zhao Yigang,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P.R. China.

¹⁷ [埃及]艾哈邁德·艾敏著，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一冊·黎明時期。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譯者序言”第5頁。

¹⁸ 曾問吾著。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影印本，第2頁。

¹⁹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圖中所標示的各種因素不存在前後的區別。